

經濟思想史學科的困局、破局與新局

賈根良



[摘要]經濟思想史學科自20世紀60年代開始逐漸衰落，在經濟學界日益被邊緣化。導致它邊緣化的外部因素是：經濟學的數學形式主義對經濟學的支配性影響；主流經濟學對“硬”科學的崇拜；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和金融壟斷利益集團對主流經濟學的強有力支持；主流經濟學家對經濟思想史的偏見；學科評估標準將經濟思想史學科貶低為低等研究。從內部看，最突出的因素就是“輝格史觀”對它的支配性影響，將該學科變成了對經濟思想的“考古學”研究，已不能對當代經濟理論的創新和政策制定提供有益的啟發。要想擺脫“輝格史觀”的支配性影響，就要重新認識經濟思想史學科所具有的其他學科無法替代的重要功能：(1)能更好地理解經濟理論的創造過程；(2)能更好地體悟

經濟政策因時因地而制宜的重要性，培養經濟學多元主義科學思維；(3)作為思想基因庫保留被排斥的經濟思想，溫故知新，創造新的經濟理論；(4)立足於經濟思想發展的歷史規律，對前沿理論創新和經濟學發展的方向進行評價；(5)通過發揮理論和政策的批判功能，啟迪、推動並且直接從事經濟理論的創新；(6)為解決實際經濟問題提供政策建議；(7)為當前經濟學發展中被忽視的重要理論問題特別是經濟學革命提供新的思路和靈感來源，並從過去的經濟思想中獲得建設新範式所需要的材料。充分發揮這七項功能，需要以新觀念來理解和研究經濟思想史，這包括新對象、新目的、新方法等，以此作為“新經濟思想史”的研究綱領。所謂“新對象”，是指將“經濟政策史、經濟政策思想史”作為經濟思想史學科的專門研究對象。所謂“新目的”，是出於解決現實經濟問題的需要，明確“經世致用”作為經濟思想史研究的目的。所謂“新方法”，是鑒於現有的經濟思想史研究忽視了通過研究過去的理論創造新理論的問題，其“歷史重建”“理性重建”的研究方法存在嚴重局限性，因此，需要大力發展“創造解釋學”的方法論。在今後十到二十年，通過反思主流經濟學的缺陷並尋找替代性的經濟理論，將使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感覺到經濟思想史學科存在的意義乃至重要性，它有可能面臨一個復興的新時期。

[關鍵詞] 經濟思想史 困局 新理論的創造

[作者簡介] 賈根良，1995年在南開大學獲得經濟學博士學位，1999年被破格晉升為教授，2000年被聘為博士生導師，2016年被教育部遴選為“長江學者”特聘教授；現為中國人民大學特聘教授，兼任中國演化經濟學年會主席、中華外國經濟學說研究會副會長、中國經濟發展研究會副會長；主要從事經濟思想史、演化經濟學、發展經濟學和比較經濟學研究，代表性著作有《國內大循環：經濟發展新戰略與政策選擇》《演化經濟學導論》《演化經濟學的綜合：第三種經濟學理論體系的發展》《勞動分工、制度變遷與經濟發展》《演化經濟學：經濟學革命的策源地》，合著有《新李斯特經濟學在中國》《美國學派與美國19世紀內需主導型工業化道路研究》等。

經濟思想史也稱“經濟學說史”，是經濟學的基礎性學科。按照中國經濟學學位點的設置，它屬於“理論經濟學”之下的二級學科，與政治經濟學、西方經濟學、經濟史、世界經濟，以及人口、資源與環境經濟學同屬“理論經濟學”的範疇。從世界角度看，近六十年來，經濟思想史學科一直處於衰落之中。2006年，格拉茨大學的柯茲(Heinz D. Kurz)教授在“經濟思想史歐洲年會”發表主席講演時指出：“經濟思想史學家已成瀕危物種，該學科被邊緣化由來已久。”^①2007年，又發生澳大利亞國家統計局擬將經濟思想史、經濟史學科劃歸到“歷史、考古學、宗教和哲學”分類中，結果遭到該國經濟思想史學家的激烈反對而作罷。在這時，歐盟研究委員會已經將這兩個學科歸類到“人類過去的歷史研究：考古學、歷史和記憶”中，在歐盟各國和澳大利亞經濟思想史家的聯合抗議和請願之下，最終在2011年重新劃歸經濟學科。在中國，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由於受到經濟學數學形式主義等強大思潮的影響，經濟思想史學科的發展狀況遠不如西方，普遍面臨着後繼乏人的狀態；相對於經濟學其他學科的繁盛而言，經濟思想史學科可謂門庭冷落。固然，學科生存環境是學科盛衰的重要原因，但學科自身存在的問題也難辭其咎。這就需要從該學科的重大基礎理論問題入手，對其發展中存在的問題進行剖析和反思，並探索新的發展方向。

一 經濟思想史學科的生存困境、價值再認識

自“經濟思想史”作為經濟學一個專門領域於18世紀下半葉誕生以來，它就不斷地吸引諸多經濟學家的關注和思考。古德溫(C. D. Goodwin, 1934—2017)認為，大約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到20世紀60年代初，經濟思想史課程一直屬經濟學專業訓練不可或缺的“核心”組成部分，但自20世紀上半葉步入“黃金時代”後，卻於60年代開始衰落，並日益在經濟學界被邊緣化。^②那麼，是什麼原因導致了它被邊緣化的呢？從外部看，主要有以下五個因素：經濟學的數學形式主義對經濟學的支配性影響；主流經濟學對“硬”科學的崇拜；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和金融壟斷利益集團對主流經濟學的強有力支持；主流經濟學家對經濟思想史的偏見；20世紀70年代後，主流經濟學所支配的經濟學研究和學科評估標準將經濟思想史學科貶低為低等研究。

儘管不利的學科生存環境是國內外經濟思想史學科不斷走向衰落的重要原因，但是，這種衰落也與經濟思想史研究自身的缺陷不無關係。在這方面，最突出的表現就是“輝格史觀”對經濟思想史研究的支配性影響。所謂“輝格史觀”，是指以當下作為準繩和參照來研究“過去”歷史的觀念和方法；或者說，是站在勝利者的立場撰寫的歷史。自英國歷史學家巴特菲爾德(H. Butterfield, 1900—1979)於1931年在《歷史的輝格解釋》一書中對“輝格史觀”進行批判以來，“輝格史觀”在歷史學界和科學史學界就成了一個貶義詞。但是，1970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薩繆爾森(P. A. Samuelson, 1915—2009)在1987年的經濟學史學會年會上發表題為《走出密室：經濟科學的輝格史綱領》的演講時，卻是貶詞褒用，提倡“輝格史觀”作為研究經濟思想史的正確方法，藉以鞏固新古典經濟學在經濟學中的主流地位。由於“輝格史觀”在經濟思想史研究中的支配性影響，將該學科變成了對經濟思想的“考古學”研究，特別是變成了按照主流經濟學的理論和範式對經濟思想史進行的“考古學”研究，已經不能對當代經濟理論的創新和政策制定提供有益的啟發，這是導致該學科在經濟學界日益被邊緣化的重要原因。

如果要擺脫“輝格史觀”對經濟思想史研究的支配性影響，就需要重新認識經濟思想史學科的重要價值。總體上說，它具有經濟學其他學科無法替代的七項重要功能：(1)能更好地理解經濟理論的創造過程；(2)能更好地體悟經濟政策因時因地而制宜的重要性，培養經濟學多元主義科學思維；(3)作為思想基因庫保留被排斥的經濟思想，溫故知新，創造新的經濟理論；(4)立足於經濟

① [德]柯茲：“經濟思想史走向哪裏？——方向不明，但仍慢慢前行”，《經濟思想史評論》1 (2010)：53—73。

② Craufurd D. Goodwin,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The New Palgrave Dictionary of Economics*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2nd edition, Vol. 4, 48-57.

思想發展的歷史規律，對前沿理論創新和經濟學發展的方向進行評價；(5)通過發揮理論和政策的批判功能，啓迪、推動並且直接從事經濟理論的創新；(6)為解決實際經濟問題提供政策建議；(7)為當前經濟學發展中被忽視的重要理論問題特別是經濟學革命提供新的思路和靈感來源，並從過去的經濟思想中獲得建設新範式所需要的材料。

當然，這七項重要功能並非自然而然就可以發揮，還需要以新的觀念來理解和研究經濟思想史，這包括新對象、新目的、新方法等，以此作為“新經濟思想史”的研究綱領。所謂“新對象”，是指將“經濟政策史、經濟政策思想史”作為經濟思想史學科的專門研究對象。原因在於，現有的經濟思想史研究偏重於經濟理論而忽視經濟政策，偏重於經濟學家的經濟政策學說而忽視政治家等非經濟學家以及在普通大眾中流行的經濟政策觀念，很少從當時歷史環境中的實際經濟政策效果和當前借鑒的角度討論並評價經濟思想史中經濟學家與非經濟學家的經濟政策思想。所謂“新目的”，是出於解決現實經濟問題的需要，明確“經世致用”作為經濟思想史研究的目的。所謂“新方法”，是鑒於現有的經濟思想史研究忽視了通過研究過去的理論創造新理論的問題，其“歷史重建”“理性重建”的研究方法存在嚴重局限性，因此，需要引入並大力發展“創造解釋學”的方法論。

古德溫在《經濟思想史》一文中指出，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引發了人們對經濟理論的反思；正是這種反思，導致了經濟學界對經濟思想史學科需求的增長，所以，該學科在“大蕭條”中迎來了隨後二十多年的“黃金時代”。按照這種理論，現在同樣可以觀察到，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長期的經濟衰退正在使人們對主流經濟學越來越失望；通過反思其缺陷並尋找替代性的經濟理論，正在使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感覺到經濟思想史學科存在的意義乃至重要性，經濟思想史學科有可能迎來一個復興程度有限的新時期。

二 經濟思想史的新興分支學科

在歐美經濟思想史學界，關於本領域或學科的名稱/稱謂一直未形成共識，目前主要集中在“經濟思想史”“經濟學史”這兩個名稱上。前者是傳統稱謂，涵蓋面廣泛；後者則是晚近出現的名稱，特別受到將該學科視為經濟學的“學科史”或“科學史和科學哲學”組成部分的經濟思想史家的青睞。參考美國經濟學會主辦的《經濟學文獻雜誌》的經濟學科分類體系以及中國的學科分類體系，在此使用“經濟思想史”這一名稱。其涵蓋範圍超過了“經濟學史”“政治經濟學史”“經濟學說史”等名稱，以容納眾多分支學科，如經濟分析史、經濟學學界史、經濟思想知識史、經濟思想編史學、經濟政策史、經濟政策思想史等等。“經濟學史”是經濟學自身發展的歷史，而熊彼特(J. A. Schumpeter, 1883—1950)卻將其等同於“經濟分析史”：“所謂經濟分析史，我是指人類為了認識經濟現象在心智方面所作的努力的歷史；換句話說，也就是經濟思想中帶有分析性或科學性這個方面的歷史。”^①但是，按照他的定義，“經濟學史”明顯地要比“經濟分析史”範圍更廣，還包括熊彼特的“經濟學的社會學”，即“經濟學學界史”。

自20世紀五六十年代以來，有三個因素促成了經濟思想史研究領域一些新興分支學科的興起。

第一個因素是《經濟思想史指南·序言》中指出的：隨着哲學解釋學、科學哲學、科學學被引入到經濟思想史研究領域，“大約自20世紀60年代初以來，經濟思想史學家們就明確地認識到經濟思想史滲透着詮釋，在其重要的問題上並非是不言而喻的。歷史是社會性建構的產物，它具體地體現出了經濟思想史學家們在他們的研究中所追求的詮釋戰略。其結果是，我們就有了三個分支學科：經濟思想史(觀念史)，作為一個學科的經濟學史(經濟學和經濟學家的社會學)和經濟思

① [美]約瑟夫·熊彼特：《經濟分析史》(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朱泱等譯，第1卷，第24頁。

想史學史”。^①在這裏，經濟思想史指的是傳統的經濟思想史研究；“經濟學和經濟學家的社會學”是指“經濟學學界史”，它與“經濟分析史”共同構成了經濟學史；而“經濟思想史學史”則是“經濟思想編史學”的組成部分。

第二個因素是在批評熊彼特的“經濟分析史”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新分支領域，這主要表現為“經濟思想的知識史”。溫奇(D. N. Winch, 1935—2017)稱，“經濟分析史”是經濟學家們作為“實踐者的歷史”，其研究目的在於理解現代理論，“他們的編史旨趣相當明確……主要關心的是以目的論的方式處理譜系的問題：誰是誰的先驅，經濟學是如何成為現在的樣子的”；^②人們從這種研究中無法瞭解和理解經濟學家們的思想是如何產生的，並使經濟學家們豐富和複雜的思想被簡化和模式化了，這實際上就是經濟思想史研究的“考古學”的一種表現。針對這種研究範式的局限性，溫奇提倡一種異於傳統經濟思想史研究類型的研究——“知識史”(Intellectual History)研究，其綱領是將當時的經濟思想置於其廣闊的歷史背景中，將哲學、政治、社會思想納入經濟思想史的研究對象，採用“歷史重建”的方法，用過去的語言和思維來理解那個時代的經濟思想。

沃特曼(Anthony M. C. Waterman)將經濟思想的知識史與經濟分析史稱作經濟思想史研究的兩種類型，並對比了其不同：經濟分析史“的目的不是發現關於我們的前輩如何思考的真實事實，而是通過仔細考察其智力的譜系和淵源，擴展我們對現代經濟理論的理解”，“在最高層次上，它是一種經濟學家的內部活動，目的在於批判性地、創造性地探索學科的理論基礎”；而知識史則“打算回答的問題是過去發生了什麼以及為什麼發生，其研究對象是文本，方法是脈絡和情境的，由於使用這種方法，作者常常需要對哲學、神學、政治學、文學和一般歷史學與對經濟學有同樣多的瞭解”。^③

第三個因素是對傳統的經濟思想史研究的不滿。正如一些學者指出的，與熊彼特提倡的“經濟分析史”不同，熊彼特之前的經濟思想史研究對象都是經濟學家的“學說”即理論與政策主張的總和^④，研究者採取的是“XX關於YY的理論是什麼”的研究模式，因此，在經濟思想史學科發展過程中，就逐漸形成了一種人物及其理論的研究模式，並長期佔據主導地位；經濟思想史家們通過這種研究，不斷地嘗試對那些青史留名的經濟學家的理論創造提出“更正確和更完整的”理解。這種“傳統的經濟思想史研究”，其主要工作就是對文本的訓詁和解釋。“經濟思想史上發表的大部分研究都致力於解釋著名經濟學家的理論和思想，主要是通過仔細閱讀他們發表的著作。此外，對著名經濟學家的理論和思想影響的討論在很大程度上局限於它們對其他著名經濟學家的影響。人們不時地或多或少地認為，這種活動可能已經達到了收益遞減的地步，對經濟學歷史的理解或者至少可以通過應用對這種傳統研究方法提供的替代性研究戰略而得到極大的豐富。”^⑤因此，當哲學解釋學、科學哲學、科學學等學科的發展被介紹到經濟思想史研究領域後，前述各種研究分支就開始興起了。

比德爾(Jeff E. Biddle)在解釋經濟思想史學科呈現多樣化研究類型的成因時指出：“那些在過去幾十年裏為經濟思想史的寫作做出貢獻的人，被各種各樣的問題和目的所激勵，他們使用了各種各樣的研究策略和材料。這種多樣性在一定程度上源於這樣一個事實，即經濟思想史學者們有着不同的興趣，因此，對於什麼類型的歷史現象最有吸引力的看法也不盡相同。但這也是由於

① W. Samuels, J. Biddle & J. Davis, eds., *A Companion to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Preface*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2003), xv.

② D. Winch, “Intellectual History and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A Personal View”, *History of Economics Review* 1(2009): 1.

③ Anthony M. C. Waterman, “Two Kinds of History of Economics”, *History of Economic Ideas* 3(2008): 106-107.

④ Oreste Popescu, “On the Historiography of Economic Thought: a Bibliographical Survey”, *The Historiography of Economics* (UK: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1991), 13.

⑤ Jeff E. Biddle, “Research Styles in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A Companion to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2003), 6.

他們對基本的史學問題有明確或隱含的不同的答案，這些問題是關於歷史的寫作目的以及實現這些目的的最佳方法。”^①儘管傳統的“人物及其理論”的經濟思想史研究模式和經濟分析史受到批評，但它們至今仍是大多數經濟思想史研究者所從事的研究類型。因為，經濟思想史的大部分研究仍是要服務於經濟學教學和研究的需要。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新興的經濟思想史學科中，雖然有不少研究者對熊彼特在《經濟分析史》中貶低經濟政策作為經濟思想史研究對象的言論提出批評，認為經濟政策學說史的研究非常重要，但“經濟政策史與經濟政策思想史”作為經濟思想史的一個新興學科卻沒有得到發展。導致這種結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經濟思想史學家們認為經濟政策史不屬他們的研究領域；而如果對經濟政策史沒有研究，那經濟政策思想史也就無從談起了。第二，經濟思想史學家們對經濟思想史感興趣，通常不是由於經濟思想對經濟政策產生了重要影響，而是出於思想觀念本身的吸引力。^②第三，經濟思想史學家們研究的目的，不是出於解決現實經濟問題的需要。所以，在戰後發展起來的新興分支學科中，無論是經濟思想編史學，還是經濟思想的知識史，抑或經濟學界史，它們基本上都是離具體經濟問題相當遠的“歷史研究”，而非直接面向解決現實經濟問題的“經濟思想史研究”。然而，從未來趨勢看，最值得發展的新興學科，應該是“經濟政策史與經濟政策思想史”。

三 經濟思想史名著中的史學理論研究

所謂經濟思想史理論，是對各種經濟學說產生與發展的理論解釋；由此形成的經濟思想史觀，是指經濟思想史學家有關經濟學說產生與發展的基本規律的世界觀。雖然經濟思想史學科至今還沒有對“經濟思想史理論”進行有意識的建構，但不能說“經濟思想史理論”在經濟思想史學科中是不存在的。目前，在經濟思想史學科中，代表性的經濟思想史理論主要有相對主義、絕對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經濟學說的“漸變說”“革命說”“革命漸變交替說”，經濟學範式的“異地物種形成原理”“兩種經濟學研究傳統交替式佔支配地位”的理論等等。由於很少有人關心這些作為學科發展基礎的“元理論”，除了前三種理論外，其他理論都沒有得到深入的討論。

“絕對主義”史觀着眼於主體的心智發展，將歷史視為一個從過去謬誤到現今真理穩步不懈的演進過程；“相對主義”史觀則着眼於經濟學說產生的社會經濟環境，將過去時代提出的每一種理論或多或少地看作是對當時狀況的反映，每種理論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反對簡單地認為最近的理論相比較早的理論錯誤更少。因此，相對主義史觀主張用歷史、經濟、社會、政治的力量來解釋經濟思想的成長以及這些力量影響經濟理論的方式。相較於“絕對主義”史觀，“相對主義”史觀更能正確地把握經濟學說產生和發展的客觀規律。在解釋各種經濟學說的產生與發展上，歷史唯物主義所強調的邏輯與歷史相統一的原則具有更基本的指導意義。

馬歇爾是經濟學思想發展“漸變說”的代表人物，但學界對這種學說並未展開過討論。“革命說”雖早已有之，但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以後，更多是與庫恩(T. S. Kuhn, 1922—1996)的“範式理論”聯繫在一起，影響較大。由於經濟思想、經濟學的發展不可能永遠處於革命狀態，所以，“革命與漸變交替說”更符合實際，進化生物學中的“間斷平衡理論”可以用來解釋經濟學說較長期的漸變被短時間的革命所“間斷”並在革命性思想基礎上又繼續漸變的現象。經濟學範式的“異地物種形成原理”，是指經濟學革命或新經濟學流派的形成往往是通過新的國家、新的地區這種地理空間上的轉移而實現的。而“兩種經濟學研究傳統交替式佔支配地位”的理論是賴納特(Erik S. Reinert)在討論“經濟理論的類型和兩種教規的基礎”時提出的：“據說，經濟學作為一門科學(或偽科學)是獨一無二的，因為相互競爭的教規可以長期並存。在其他科學中，周期性的和激

① Jeff E. Biddle, “Research Styles in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A Companion to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2.

② [英]特倫斯·W. 哈奇森：《經濟學的革命與發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李小彌、姜洪章等譯，第351—352頁。

進的格式塔轉變，導致了舊的理論軌道被終結並開始了一種新的開端。……但在經濟學中，幾個世紀以來，‘地球是平面’與‘地球是圓形的’這兩種理論卻一直長期並存。在本文中，我們將論證一種對今天的古典與新古典主流經濟學進行替代的教規，這種教規要比目前的主流經濟學歷史更悠久，它支配了文藝復興時期的世界觀。借用肯尼思·阿羅(Kenneth Arrow)的隱喻，‘這種傳統就像地下的河流，每隔幾十年就會沖出地面’。”^①

當然，歸入“經濟思想史理論”的經濟思想並不祇是上面談到的這些。歷史上許多著名經濟學家在提出和討論其經濟學說時，都對前人的經濟學說進行了大量的討論，相關著述也都隱含着經濟思想史觀和經濟思想史論，所以，他們同時也是經濟思想史家，如亞當·斯密(A. Smith, 1723—1790)、馬克思(K. H. Marx, 1818—1883)、李斯特(F. List, 1789—1846)、羅雪爾(W. G. F. Roscher, 1817—1894)、凡伯倫(T. B. Veblen, 1857—1929)、熊彼特、凱恩斯(J. M. Keynes, 1883—1946)、沙克爾(G. L. S. Shackle, 1903—1992)等。^②

在經濟思想史研究中，熊彼特的《經濟分析史》、米切爾(W. C. Mitchell, 1874—1948)的《經濟理論的類型：從重商主義到制度主義》、普利布拉姆(Karl Pribram)的《經濟推理史》被經濟思想史家珀爾曼(Mark Pelman)譽為該學科的三大權威性名著。^③由於後兩部著作還沒有被譯成中文，因此，這裏對這三部名著的史學理論做一概要性評述。

米切爾在《經濟理論的類型》中，提出了一種與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有親和力的經濟思想史觀：經濟思想史中的重要經濟理論無不是當時經濟、政治、社會環境的產物。他強調了人性形成的制度因素，反對主流經濟學將經濟行為的心理基礎排除在外。米切爾的思想，對於發展馬克思主義的經濟思想史觀具有借鑒價值。尤其是，他的經濟思想史觀是對內部歷史觀或絕對主義經濟思想史觀批判的先聲。但是米切爾的經驗主義錯誤，使得他對西方經濟思想發展史的認識仍存在缺陷。

熊彼特的《經濟分析史》將經濟政策排除在外，認為經濟分析的發展具有其內在邏輯，將經濟分析史定義為獨立於環境因素特別是獨立於哲學和意識形態因素的經濟理論和分析工具的歷史，因而成了絕對主義經濟思想史觀的代表性著作。他在《經濟分析史》中同時將瓦爾拉斯(L. Walras, 1834—1910)靜態的一般均衡理論與他自己的動態經濟發展理論作為評價標準，在一定程度上展現了經濟學的多元性。然而，由於囿於其絕對主義經濟思想史觀中的諸多缺陷，他梳理的“科學觀念的源流”主要偏重於西方主流經濟學研究傳統，沒有認識到西方非正統經濟學研究傳統也形成了一條獨立的並與之相平行的“科學觀念源流”。

普利布拉姆的《經濟推理史》具有兩個突出的特徵：一是該著作強調經濟學中不同推理模式對經濟思想史中不同研究傳統的形成和發展的決定性影響，而不同的推理模式又被看作是歷史上曾流行的哲學社會思潮的產物；二是認為經濟思想史上持續存在着多元的經濟學研究傳統，並且一度形成了假設推理、有機推理、辯證推理這三種模式及其對應的經濟學研究傳統並存的多元格局，並將這些推理模式的根本性分歧追溯到了唯名論與本質主義的矛盾。普利布拉姆的推理模式概念，很容易讓人們聯想到如歸納法、演繹法等具體的推理形式；但是，這一概念的外延要廣泛得多，與經濟學方法論更加接近。他的研究對經濟思想史史學理論的發展做出了貢獻，為經濟學多元主義科學精神提供了深邃的歷史視野，但其唯名論與本質主義的區分並沒有正確理解科學實踐的實質。他將經濟思想史中不同研究傳統的形成和流變歸於當時流行的哲學社會思潮的觀點，

① [挪]埃里克·S. 賴納特：“替代性教規：文藝復興經濟學史”，賴納特、賈根良 主編《窮國的國富論：演化發展經濟學論文選》(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上卷，第2頁。

② 例如，顧海良明確地提出了“馬克思經濟思想史學”“馬克思經濟思想史觀”概念〔顧海良：“經濟思想歷史的‘自我批判’與‘歷史路標’——馬克思經濟思想史學觀探討”，《經濟學家》8 (2013)：5—16。〕

③ M. Perlman, “Perceptions of our discipline: three magisterial treatments of the evolution of economic thought”, *History of Economics Society Bulletin* 2(1986): 9-28.

以及他對很多經濟學說的評價，雖然存在着偏頗之處，但他的著作突顯了經濟思想史對經濟學方法論研究的重要作用，有助於從歷史角度進一步認識現代經濟學在方法論問題上的分歧，為經濟學範式的變革提供歷史經驗和理論的支持。

四 經濟思想的兩大傳統及其現代發展

追溯經濟思想史的源頭，還可以發現，不僅經濟學或經濟理論存在着兩大思想傳統，在實際經濟政策如產業政策、就業與宏觀經濟政策、貨幣金融政策中也內含着兩大思想傳統。

其一，國際學術界在產業政策的研究方面存在着兩大理論和政策範式：“演化經濟學”與“後新古典經濟學”。這兩種不同的範式，在發展經濟學領域中表現為“演化發展經濟學”與“新結構經濟學”的不同。兩者的產業政策基於完全不同的理論基礎：“技術趕超”與“比較優勢”。與新結構經濟學有關政府作用的理論仍是以新古典經濟學的市場失敗理論為基礎不同，演化發展經濟學則是在批判市場失敗理論的基礎上提出了一系列新理論。“技術趕超”是以技術能力為基礎的，而“比較優勢”則是以要素稟賦為基礎的，兩者在研究範式上的不同，實際上是經濟思想史中古老的李斯特問題的再現：國民財富的基礎究竟是生產力還是交換價值？所謂交換價值，就是亞當·斯密的“蓄積的財富”，也就是新結構經濟學的“(經濟)剩餘”。因此，演化發展經濟學與新結構經濟學在經濟思想史上的分歧就可以歸結為：產業政策的理論基礎究竟是應該回到亞當·斯密，還是回到李斯特？在演化發展經濟學家們看來，新結構經濟學無法為中等收入國家突破“中等收入陷阱”提供理論指導，不適合中等收入國家，特別是在運用於作為超大型發展中國家的中國國情時存在着嚴重缺陷；即使是運用於低收入國家，也是有局限性的。新結構經濟學的比較優勢理論及其發展戰略是與中國自主創新和“創新驅動發展戰略”背道而馳的。事實證明，技術趕超戰略更適合中國國情。以自主創新為核心的基礎全面的價值鏈升級，正是中國所有地方政府面臨的共同挑戰。

其二，在中國，原發式哲學和經濟思維模式，與西方非正統經濟學的研究傳統之間存在着驚人的相似性。例如，中國古代的常平倉制度，與凱恩斯經濟思想、“後凱恩斯主義”特別是現代貨幣理論學派的就業保障理論之間，有着相關的歷史聯繫。^①常平倉在“羅斯福新政”時期，被美國人借鑒發揮，並對美國走出大蕭條、農業改革乃至國家崛起都產生了深遠影響。^②中國古代針對糧食實施貴糶賤糶、斂散以時的常平倉法，是對《管子》“輕重論”的具體運用，體現出中國傳統思維的辯證觀和中道精神。常平倉的緩衝儲備機制在歷史實踐中被推展至廣義，其中將勞動力納入緩衝糶糴的“以工代賑”是一項重要的制度發明。凱恩斯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一書的要旨，亦在於構建現代意義的廣義常平倉：市場對生產要素的“棄”與“取”內生出經濟波動，而政府的作用就在於借助緩衝糶糴機制與市場形成有效的互補與互動，實現經濟穩定的目標。後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就業緩衝儲備”理論和現代貨幣理論學派的就業保障計劃深化了這一思想，凸顯出“就業”之“常平”對於經濟穩定的重要意義。

其三，就業保障計劃和功能財政是現代貨幣理論學派的兩大政策主張。就業保障計劃的靈感來源，可以遠溯至中國古代的“以工代賑”實踐；在美國，“羅斯福新政”是其先驅。但與這些臨時性應對經濟危機的先驅實踐不同，“就業保障計劃”的設計則是一種常設的制度安排，類似於中國古代“常平倉”制度。其基本理論是：政府按照最低工資水平雇用所有願意工作的勞動者，從而保證充分就業。由於勞動力緩衝儲備的存在，在工資存在上升壓力的時候，勞動者就從就業保障計劃部門流向私人部門；在工資存在下降壓力的時候，勞動者就從私人部門流向就業保

① 錢文：“從‘常平倉’到‘就業緩衝儲備’——中國經濟傳統的現代價值探論”，《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5 (2016)：12—23。

② 李超民：《常平倉：美國制度中的中國思想》(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2002)。

障計劃部門，因此，就業保障計劃起到了穩定工資進而穩定物價的作用。這種勞動力的常平倉機制，從根本上說是契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因而在中國可以成為常態性的制度設計，這是中國不同於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制度優勢。

其四，在貨幣金融政策史中，19世紀的三場大討論是非常著名的，這就是世紀初英國的金塊論爭、40年代的通貨學派與銀行學派的爭論、美國南北戰爭結束後有關綠背紙幣存廢的大討論。這三場爭論因為所面對的具體問題不同，因而對貨幣問題關注的側重點也就不同：金塊論爭討論的是英國戰時通貨膨脹的問題，以及與此相聯繫的紙幣可兌換性問題，因此貨幣數量與價格水平的關係是這次論爭的主要交鋒點；通貨學派與銀行學派爭論的對象是以《1844年英格蘭銀行條例》為代表的銀行業改革，這次改革是在金融危機頻發的大背景下進行的，因此雙方討論的核心問題是金融體系的管理問題；而綠背紙幣的論爭討論的則是綠背紙幣可兌換性和存廢問題，這個問題的回答取決於非商品貨幣是否可以持續存在，因此，“貨幣的本質是什麼”就成了美國綠背紙幣論爭的核心交鋒點。然而，儘管強調的側重點有所不同，但對立的雙方分別站在了商品貨幣論（反對綠背紙幣者、金塊論者、通貨學派）與信用貨幣論（綠背紙幣者、反金塊論者、銀行學派）的兩大傳統的立場上，而且在每一個傳統內部又存在着非常強的理論一致性和相似性，

其五，明斯基經濟思想與非正統經濟學傳統之間也有深刻的淵源。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在學術圈內外掀起了一股強勁的明斯基思潮，以至於這場危機被冠之以“明斯基時刻”，使得在主流經濟學界很少人知曉的明斯基(M. Minsky, 1927—2016)聲名大噪。但是，經濟學界對明斯基經濟思想的理解基本上仍停留在“表層結構”，而無法深入其“深層結構”，因而目前的研究更多是着眼於明斯基以及當代的經濟危機、經濟周期理論和政策論爭，而忽視了周期性經濟不穩定性現象及其理論解釋的悠久歷史。其結果是，人們不僅對明斯基思想的突然流行大惑不解，而且對經濟波動這一古老的主題也缺乏深入理解。在經濟周期理論研究領域中長期存在的外生周期傳統與內生周期傳統之間的競替起伏，實際上是西方經濟思想史中長期存在的主流經濟學的牛頓主義思維傳統與非主流經濟學的達爾文主義傳統之間交替演化的表現。達爾文主義經濟學研究傳統是明斯基經濟思想創新的源泉，祇有深入研究這一傳統，纔能掌握明斯基經濟理論的“深層結構”。2008年“大衰退”以來明斯基經濟思想的“重新發現”和時興，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這種內生周期傳統以及背後更廣泛的達爾文主義經濟學研究傳統的復興和回歸。但從過去研究傳統交替的歷史經驗來看，儘管這種非正統經濟學傳統近十年來有所復興，但因正統經濟學傳統的路徑依賴和鎖定，其進一步發展和流行仍然面臨着重大掣肘。

其六，經濟政策史和經濟政策思想史中的兩大政策範式與經濟理論史中的兩大經濟學研究傳統密切相關。正如西方主流經濟學不能解釋特朗普(Donald Trump)的上臺，並在應對全球新冠病毒疫情大危機中被拋棄在一邊一樣，雅各布(Michael Jacobs)、馬祖卡托(Mariana Mazzucato)在《重新思考資本主義》一書的“導言”中指出：“正統經濟學不能解釋西方資本主義在最近十年中所面臨的主要問題——疲軟的增長、金融不穩定、下降的投資、金融化、生活水平的停滯、日益上升的不平等和危險的環境風險。……幸運的是，在經濟學中有大量的資源對此類問題進行過研究。因為，資本主義經濟的這些特徵幾乎從來就不是自我揭示的，因此，它們在過去一百多年的經濟學中得到了研究。這些研究構成了一些偉大經濟學家著作的基礎，這些經濟學家是卡爾·波拉尼、約瑟夫·熊彼特和梅納德·凱恩斯以及最近的演化經濟學、制度經濟學和後凱恩斯主義經濟學。……以這種經濟學為基礎的分析可以對目前的經濟政策進行徹底的批判，並提出強有力的替代性觀點。”^①這種替代性的非主流經濟學傳統(又稱非正統經濟學)，可以稱之為“西方政治經濟學”。由於“西方政治經濟學”對市場經濟的運行機制和規律的研究比“西方經濟學”提供了更

① Michael Jacobs and Mariana Mazzucato, *Rethinking capitalism: economics and policy for sustainable and inclusive growth* (Oxford: Wiley-Blackwell, 2016), 17-18.

現實和更深刻的描述和分析，其理論研究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創新具有更直接和更重要的借鑒價值。

五 經濟政策史與經濟政策思想史

以事實為依據，是歷史研究的第一要義。然而，史學界有一種說法，歷史的真實僅僅是指主觀的真實，絕不可能是客觀的真實。這種看法對於某些歷史研究也許正確，但對於晚近的許多重大歷史事件來說，絕對是不成立的。例如，自中世紀以來世界經濟中貿易保護和自由貿易的歷史，由於它是由一系列有歷史記載的歷史事件所構成，人們無法否認它是客觀的真實。祇有根據這種客觀的真實，還原歷史的真相，纔能立於不敗之地。例如，英國在1846年取消《穀物法》是從保護主義轉向自由貿易政策的開端，而在這時，英國工業革命業已完成，那麼，個別歷史學家和經濟思想史家所謂的亞當·斯密的《國富論》是“英國工業化的指導思想”“英國工業革命的《聖經》”的立論基礎不知來自何方？

更進一步，在自由貿易被視作真理的中國，又如何解釋第一、第二次工業革命都是在當時作為後發國家的英國和美國在銅牆鐵壁般關稅保護之下發動的？對此，森哈斯在《歐洲發展的歷史經驗》一書中指出，與發達國家之間的“選擇性脫鉤是後發展取得成功必不可少的先決條件”^①。也就是說，保護主義是後發國家邁入發達國家行列的必由之路。歷史經驗還說明，即使是發達國家，實施保護主義也是屢見不鮮的。然而，由於大學裏的經濟思想史課程變成了“經濟分析史”，很少有甚至完全沒有經濟政策思想史的內容，而按照主流經濟學範式編寫的經濟史，也很少有經濟政策史的內容。即使是在相關研究中，“雖然有大量關於美國經濟增長的文獻，但是大多都不是從追趕的角度入手，也就是說並沒有集中在其他國家(地區)可以從美國的經濟增長經驗中學習到什麼、應該做什麼(或者不應該做什麼)以及實現本國(地區)的成功追趕”^②。在這種情況下，“經濟政策史和經濟政策思想史”的研究就顯得尤為重要。

首先，揭露流行經濟理論對經濟史的歪曲，還原經濟史的真相。考察英國從13世紀末至英國工業革命(1760—1830)完成時的經濟政策史，可以看出，英國工業革命是重商主義經濟政策而非斯密學說的產物。英國重商主義經濟政策成為工業革命前提條件的三個因素是：模仿與技術創新；關稅保護的關鍵性作用；黑洞一般市場需求的巨大影響。帕塔薩拉蒂(Prasannan Parthasarathi)在《為何歐洲走向富強，而亞洲卻沒有？——1600—1850年全球經濟的岔路口》^③一書中，通過詳盡的史實，揭示了重商主義在英國工業革命、英印乃至亞歐經濟“大分流”中的關鍵性作用，從而在推翻主流學術界長期以來對重商主義否定評價的思想潮流中，成為一本不可多得的著作。帕塔薩拉蒂的著作雖然是在“大分流”範式下撰寫的一本全球史著作，因而不免帶有後者的種種缺陷，但它對國家作為分析與比較單位的研究傳統的重申，對英國工業革命爆發原因的分析，以及對錯誤經濟理論如何導致經濟史研究扭曲的揭露，不僅對學術研究而且對國家經濟政策的制定都具有重要的啟發價值。

瞭解經濟史的真相對於國家經濟政策的制定尤為重要。早在19世紀初，美國學派早期代表人物丹尼爾·雷蒙(D. Raymond, 1786—1849)就針對亞當·斯密的經濟學說在美國的流行，一針見血地指出，英國並不是靠亞當·斯密的建議致富的，而他們卻為了自己的利益讓別的國家來遵循這一方案，“這就很好地揭示了他們的目的，即鼓吹亞當·斯密理論體系的作用好讓別的國家上當，而他們自己是絕不會被自己所欺騙的”。^④通過對世界經濟史的深入觀察，可以發現，從18

① [德]迪特·森哈斯：《歐洲發展的歷史經驗》（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梅俊傑譯，第3頁。

② [挪]詹·法格博格等主編：《牛津創新手冊》（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09），柳卸林譯，第507頁。

③ Prasannan Parthasarathi, *Why Europe Grew Rich and Asia Did Not: Global Economic Divergence, 1600-185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④ Daniel Raymond, *Thoughts on Political Economy* (Baltimore: Fielding Lucas Jr., 1820), 134.

世紀末的英國一直到20世紀80年代的日本、韓國，重商主義的“進口原材料，出口工業製成品”無不是一國崛起的根本性指導原則。然而，在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新國際分工”中，這一原則應該有所修正：雖然製造業仍具有基礎性的作用，但祇有遵循“進口低端產品，出口中高端產品”的新李斯特經濟學原則，後發國家纔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進入發達國家的行列。

其次，瞭解和研究經濟政策史和經濟政策思想史有助於提高對流行的經濟學思潮的辨別力，找到適合本國國情的經濟政策範式。18世紀下半葉的法國、英國雖然都出現了經濟思想的轉變，即從重商主義轉向自由貿易主義，但這種轉變對兩國經濟政策的影響卻是截然不同的。1786年《伊甸條約》的簽訂過程表明，法國受到重農學派的影響，在經濟政策上信奉自由貿易主義；相反，英國的對外經濟政策卻沒有受到斯密經濟學的影響，依然以重商主義為導向。英國與法國簽訂《伊甸條約》時雖然表面上符合自由貿易主義，但其真實的理論基礎和目的卻並非如此，即經濟政策與流行的經濟思想出現了背離。這說明，那種將重商主義簡單地等同於關稅保護主義的看法是錯誤的；重商主義針對不同國家和不同行業採取的關稅保護或者自由貿易政策，祇是為實踐其重工主義的原則而採取的不同手段和策略而已。經濟政策制定者如何避免不被流行的經濟學思潮所左右對國家命運具有重大影響，特別是對發展中國家來說尤其重要。這可以通過以下三方面提高對流行的經濟學思潮的辨別力：對發達國家目前的經濟政策行為“觀其言，察其行”；洞悉流行的經濟學思潮興起的根源並認識到將來走向沒落的可能性；深入研究本國實際，然後在綜合這些因素的基礎上，思考哪種經濟學說可以作為經濟政策制定的理論基礎。

最後，反思本國經濟史，為經濟政策制定提供宏大敘事的歷史大視野。例一，是什麼原因導致“中日大分流”。所謂“中日大分流”，是指中日兩國在近代迎接西方列強挑戰上出現了“大分流”：日本加入到帝國主義列強的行列，而中國卻淪為了其半殖民地。日本明治維新之所以成功，關鍵因素在於其領導集團集體接受了李斯特主義經濟學，從而對其保護民族經濟、財政金融改革、統一國內市場和建立中央集權體制等改革活動產生了決定性影響；而中國從洋務運動到五四新文化運動，精英階層祇考慮到了技術引進、政治制度革命、文化變革在近代化中的重要性，唯獨沒有考慮民族國家經濟制度建設在國家近代化中的基礎性和決定性作用，對李斯特主義經濟學幾乎無人知曉，更沒人認識到這種經濟意識形態對中國近代化的重大意義。這是導致“中日大分流”的首要因素。例二，國家對工業化的領導在後發工業化中的關鍵性作用。以往研究者多認為，中國作為一個典型的後發展國家，其工業化道路具有由國家主導的特徵，這偏離了工業化的“自然”模式。但事實上，國家參與工業化，是世界經濟史的常態而非例外；因為，工業化本身是與民族國家建構聯繫在一起的，具有非經濟的政治—軍事維度。^①中國的工業化始於軍事動機，但由市場主導並以私人資本為主體的工業化更具成效。然而，20世紀30年代的國家缺位，阻礙了中國的政治—經濟發展，並激起國家“凌駕”市場的反向運動。一種新李斯特主義的演化圖式認為，工業化是由國際競爭引發的、國內具有不同觀念的精英鬥爭的結果。精英可以具有多樣化的動機。當那些具有整體及長遠利益觀的精英佔據上風，並找到適宜的手段高強度地參與國際競爭時，工業化就能夠啟動並得以維持。

六 從貧困走向富強的經濟學：學說史與創新

發展經濟學是研究欠發達經濟向現代經濟歷史性轉變的機制和政策的分支學科，因此，“從貧困走向富強的經濟學”可以看作是發展經濟學的別稱。從1943年羅森斯坦-羅丹發表《東歐與東南歐國家的工業化問題》，一直到20世紀60年代末，經典發展經濟學作為新古典主流經濟學的一種替代性經濟學佔據主流地位二十餘年。這一時期的發展經濟學在理論框架上是結構主義的，

① 嚴鵬：“國家作用與中國的工業化道路：一個新李斯特主義的解讀”，《當代經濟研究》12（2015）：20—29。

基本理論主要是劉易斯(W. A. Lewis, 1915—1991)的“二元經濟論”“依附論”和羅斯托(W. W. Rostow, 1916—2003)的“經濟增長階段論”。但是，在進入20世紀70年代以後，新古典經濟學在該領域捲土重來，發展經濟學作為經濟學的一門特殊分支學科的主張遭到貶斥，長期經濟發展的宏大理論不再受到重視。到了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新古典經濟學已演變成發展研究的主流。其特徵是，將新古典微觀經濟學的新發展運用於對發展中國家經濟的研究，新自由主義的“華盛頓共識”支配了發展政策的制定。新古典經濟學研究範式至今仍佔據着多數大學的發展經濟學講壇，倫敦經濟學院的羅伯特·亨特·韋德(Robert H. Wade)和劍橋大學的張夏準(Ha-Joon Chang)是目前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兩位著名的經典發展經濟學家。

進入21世紀後，隨着“華盛頓共識”在發展中國家的失敗，反對新古典經濟學在發展研究領域的支配性影響並瞭解經濟思想史的發展經濟學家們開始反思發展經濟學的歷史，他們發現，在1943—1970年間，以結構主義著稱的經典發展經濟學嚴重忽視了經濟思想史中源遠流長的先驅思想，因而出版了《發展經濟學的起源：經濟思想流派如何研究發展問題》《發展經濟學的先驅：偉大經濟學家論發展》等著作；鑒於這種發端於重商主義經濟學並替代新古典經濟學的發展經濟學傳統與現代演化經濟學有密切的聯繫，2005年初，中國學者賈根良與挪威經濟學家賴納特共同為中國讀者主編了《窮國的國富論：演化發展經濟學論文選》(*The Other Canon of Economics: A Selection on Essays of Evolutionary Development Economics*)，這就是“演化發展經濟學”的由來。所謂“演化發展經濟學”，就是一種將重商主義經濟學、李斯特經濟學、美國學派、馬克思經濟學說、舊制度學派、熊彼特經濟學和現代演化經濟學包括在內的關於國窮國富的經濟學說(參看圖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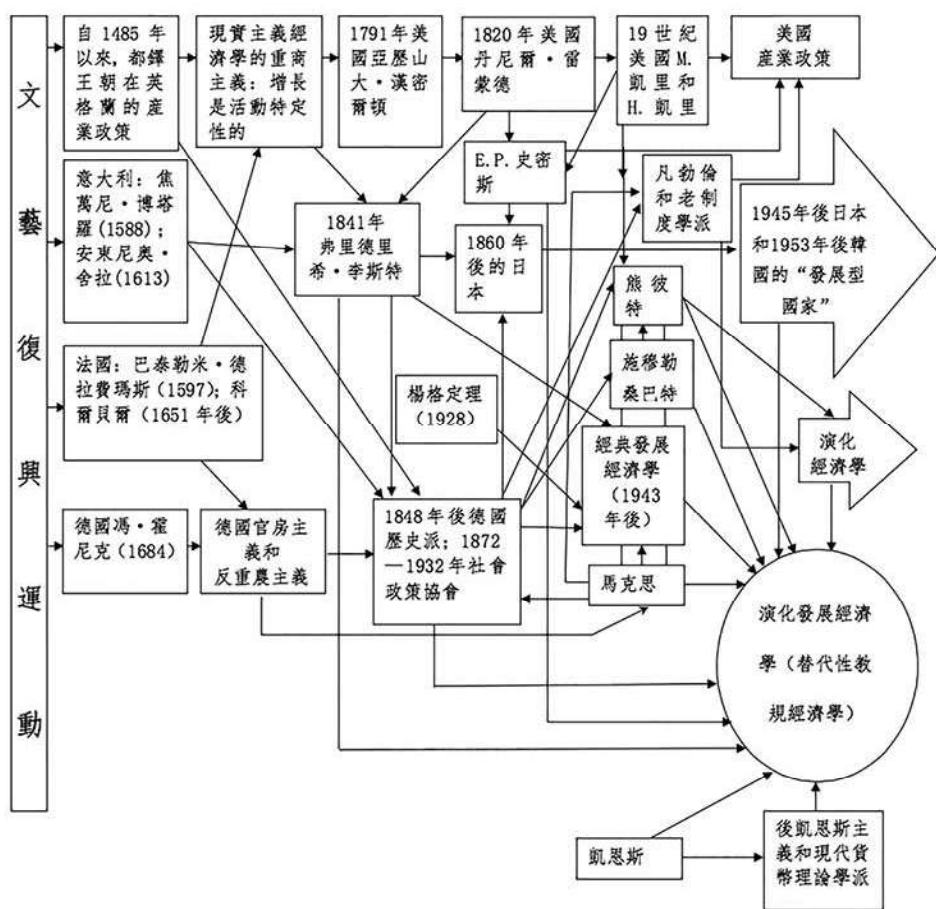


圖1 演化發展經濟學的系譜圖

從圖1可以看出，西歐主要國家(意大利、法國、英國、德國)的晚期重商主義經濟學是最早的發展經濟學，對美國學派和李斯特經濟學產生了重大影響，分別成為推進英國、美國、德國崛起的經濟學說，並對日本明治維新後的經濟政策產生了深遠影響，成為“中日大分流”的重要因素。2016年，賴納特等人編輯出版了基於這種研究傳統的《替代性經濟發展理論手冊》。但是，他們並沒有對20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的新國際分工和美元霸權等世界經濟的重大結構變化展開研究，而舊有的李斯特經濟學和國外的“新李斯特經濟學”(Neo-Listian economics)在處理這些問題上存在着嚴重的不適應，於是，就有了中國“新李斯特經濟學”(New Listian economics)理論的提出。^①之所以創建中國“新李斯特經濟學”，初衷是為了解決中國經濟發展面臨的挑戰，改變李斯特經濟學在中國被邊緣化的狀態，恢復民族國家經濟發展在政治經濟學研究中的核心地位。

作為經濟思想史教科書中必講內容的“重商主義”，其核心觀點長期以來被誤讀為“財富即貨幣，貨幣即財富”，其經濟政策體系也錯誤地被看作是建立在將金銀貨幣與財富混為一談的基礎之上。然而，雖然大部分早期重商主義者受社會環境的影響，誤以為“財富即貨幣，貨幣即財富”，但仍有一些早期重商主義者在當時就已經認識到，製造業纔是最大的財富之源。晚期重商主義，主要是圍繞着如何發展製造業展開的，關注焦點是如何通過發展製造業使國家富強。正如羅斯托指出的：“重商主義國內政策的綱領，在工業化前的社會裏，構成了相當典型的一整套現代化的活動，直到今天也是這樣。”^②在對外經濟關係上，晚期重商主義的經濟政策體系也一直被應用於指導落後國家的崛起。目前高校教科書中的西方經濟思想史講述，應該還重商主義以本來面目。

經濟思想史研究的目的是為了解決實際問題。2016年以來的世界經濟劇變表明，李斯特經濟學仍是不可多得的靈感來源。特別是在目前處於自立圖強還是自甘依附的歷史選擇關頭，李斯特的“主權國家經濟學”仍具有重要的啓示意義。由於西方的“新(Neo)李斯特經濟學”未能深入研究20世紀70年代以來世界經濟結構的重大變化，也不可能反映社會主義制度的內在要求。中國的“新(New)李斯特經濟學”在吸收現代演化經濟學、馬克思、凱恩斯、“現代貨幣理論”等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礎上，致力於創建“國民經濟學”的中國政治經濟學學派，並先後於2015年召開了“紀念李斯特經濟學傳入中國90週年”、2019年舉辦了“紀念李斯特誕辰230周年暨新李斯特經濟學研討會”，試圖為中國經濟發展戰略的變革做好理論先行和政策設計工作。

2020年全球新冠病毒疫情的暴發，對世界經濟的影響實際上類似於戰爭的影響，必將引發世界經濟結構的重大改組。自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外需作為中國經濟增長發動機的動力急劇衰減，美國推行的“美國優先”戰略對中國的出口導向型經濟再次造成打擊；而此次新冠病毒疫情導致的世界經濟大危機，直接導致了外需作為增長發動機的熄火，它必將推動各國更加注重新國內生產和內需，以價值鏈分工為代表的全球化將會出現倒退，“保護主義”將會愈演愈烈。在這種歷史大趨勢下，中國應該在實施“不對稱全球化戰略”(對發達國家淺度全球化和對“一帶一路”國家深度全球化)、“略有逆差”外貿戰略的同時，全面轉向內需，在國內實施財政開支補足內需不足的“國內經濟大循環發展”的新戰略。這也是中國“新李斯特經濟學”近年來一直所倡導的。

〔編者註：此文是作者承擔的中國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外國經濟思想史學科建設的重大基礎研究”(14ZDB122)的代表性成果，應編者之邀，在課題結項稿“導論”的基礎上做了改寫和擴充。〕

[責任編輯、校對：田衛平]

① 賈根良：《演化經濟學的綜合：第三種經濟學理論體系的發展》(北京：科學出版社，2012)；《新李斯特經濟學在中國》(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

② [美]羅斯托：《這一切是怎麼開始的——現代經濟的起源》(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黃其祥等譯，第46頁。